

BOOKMAN TRANSLATION LIBRARY

翻譯閬境

Liminality of Translation:
Subjectivity, Ethics,
and Aesthetics

主體、倫理、美學

李育霖 著



翻譯閬境

Liminality of Translation:
Subjectivity, Ethics,
and Aesthetics

主體、倫理、美學

李育霖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翻譯閩境：主體、倫理、美學 / 李育霖著. --

一版. — 臺北市：書林，2008.04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445-249-1 (平裝)

1. 翻譯學 2. 文集

811.707

98004245

翻譯閩境：主題、倫理、美學

著 者 李育霖

編 輯 張毓玲

封面設計 張卉君

出 版 者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100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60 號三樓

電 話 02-23684938 · 02-23687226

傳 真 02-23688929 · 02-23636630

發 行 人 蘇正隆

出版經理 蘇恆隆

業 務 部 北區：106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之5 Tel: 02-2368-7226

中區：403 台中市五權路2之143號6樓 Tel: 04-2376-3799

南區：802 高雄市五福一路77號2樓之1 Tel: 07-229-0300

郵政劃撥 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bookman.com.tw>

經銷代理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 號四樓

電話 02-27953656 (代表號) 傳真 02-27954100

出版日期 2009 年 4 月初版 (修訂)

定 價 250 元

I S B N 978-957-445-249-1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份內容者，須徵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同意或書面授權。
本書由成功大學補助出版。

序

關於翻譯問題的關注與研究興趣主要來自於個人的生活、學習、與寫作經驗。大學時期我在外語學院主修的是日文及日本文學，後來到美國讀比較文學研究所，學院的訓練與要求無可避免地周旋在以歐洲思想傳統（主要為德、法）為基礎的哲學及文學理論中，更確切地說，是周旋在無法逃離的西方思想風暴中、或陷溺在似乎永遠摸不著頭緒的語言與文化泥淖中。回國之後在外文系執教的日子裡，除了語言與文學的課程外，令人費盡心力的仍是「翻譯」的課程。翻譯似乎勢在必行，但又令人望之卻步。我在翻譯《德勒茲論文學》（麥田，2006）一書的過程中對於翻譯這一「行業」有著深刻體會。翻譯迫使語言進入荒原，而翻譯者站在語言森林的外部，弄不清自己究竟將「外語」譯成「母語」，還是將「母語」譯成了「外語」。

轉入台灣文學研究的領域後，在「後殖民」的研究氛圍中，讓我更清楚發現作為第三世界的公民，「業已生活在翻譯中」。當自己拿起筆撰寫學術論文時，陌生的中文「語彙」或「脈絡」已不能幫我完成論文，於是，論文寫作變成一趟在多種不同的語境間來回奔波、協商的歷程。翻譯不只是表達的形式而已，翻譯已經是一種生存的「樣態」，一種第三世界人民的「宿命」。而我在台灣文學

作家的作品中發現同樣的「處境」或「創傷」。至少一百年以前，不管使用漢文、白話文、日文、「台灣話文」、羅馬字、或其他可供使用的語言符號，前代文人以「翻譯」模擬「現代」世界，一百年以後，此一「翻譯」事業尚未完成，仍將繼續，作家或學者仍將繼續生活、糾纏在翻譯之中，但從另一角度看，翻譯卻也成為歷史開創的動力與軌跡。前代文人透過「翻譯」將台灣接枝到世界的舞台，同時也在歷史中「翻譯」自身。因此，台灣現代文學史便是一部「寫作－翻譯」的歷史，換句話說，歷史在作家的翻譯書寫中闡明自身。作家鍾肇政曾談及自己的寫作經驗：

當我有了寫作念頭時，就想以什麼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意思。首先我想出來的方式是，先用日文寫。……於是我先用日文寫完全文，然後自己再翻成中文，好不容易才完成了作品。透過這種過程。我一步一步進行了創作。於是從純粹的翻譯階段逐漸地熟練，接著進入的階段到目前為止一樣地先以日文思考，然後在大腦轉換成中文，再直接以中文寫在稿紙上。所以我到這一階段所寫出來的已經是中文，我稱這一階段為「譯腦」。……這是第二階段。¹

這是鍾肇政先生的「譯腦」過程，不只包括林亨泰、鍾肇政、

¹ 引自鍾肇政著，戴嘉玲譯，〈論臺灣文學—從「譯腦」的體驗談起〉，《臺灣文學評論》4卷1期，2004年1月，頁98。此為1984年9月鍾肇政於日本天理大學以日文演講的內容紀錄。

葉石濤等的所謂「跨語世代」必須「譯腦」，賴和的「台灣話文」書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日文作家龍瑛宗、張文環、呂赫若、巫永福等人，在摹寫在地景物時也要經過「譯腦」的過程。甚至戰後，以中文寫作的台灣鄉土文學作家，在語句的琢磨中也要「譯腦」。全球化下，誰說著自己的「母語」？台灣人無論作為帝國邊陲的「化外之民」、殖民地臣民、第三世界公民、或全球化下的人民，早已處在重疊的語言境域中，「譯腦」也早已是我們的處境與生存樣態。

本書主要是這幾年的國科會研究成果，章節中的幾篇文章也曾以不同樣貌在相關研討會或期刊上發表。一些構想的成形，主要則是在讀書會及研討會中與前輩同好切磋對話的結果。本書的出版，除了要感謝學術界眾多的前輩及朋友對我的指導與關懷外，更要感謝賴俊雄教授及書林出版公司張毓玲小姐在出版過程中的協助。成大台文系博士班學生鳳氣至純平與碩士班學生張育燕的耐心校稿，以及碩士班學生張卉君在出版及編輯事務的大力幫忙，特別在此致謝。另外，本書獲成功大學頂尖辦公室補助出版，在此一併致謝。當然，最要感謝的還有我的家人，他們的不斷地的鼓勵、支持與諒解，才得以讓我繼續專注於學術研究。

【目次】

序

第一章 1

導論：翻譯美學與生物政治

第二章 23

翻譯作為逾越與抵抗

——論賴和小說的語言風格

賴和小說中的翻譯書寫

不可能的翻譯

翻譯、「母語」、與「在地傳統」

翻譯的逾越與抵抗

翻譯與「少數方案」

第三章 59

翻譯與主體技藝

——台灣日本語文學中的翻譯書寫及其主體歷史

台灣的殖民翻譯書寫

翻譯表述中的罅隙

文化差異與主體歷史

翻譯「場域」與主體「技藝」

第四章 89

文化翻譯的邊境

——再讀西川滿〈赤嵌記〉

「文化翻譯」的視角

異國情調的系譜——荒廢之美

「鬼魅」與驚奇

文化翻譯的邊境

第五章 135

翻譯與地方文學生產

——以王禎和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為例

文化翻譯的界限

王禎和書寫中的「翻譯」

翻譯渡越主體及其書寫樣態
遊牧主義及其變向

結論 159

附錄 165

台灣作為方法

——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亞洲與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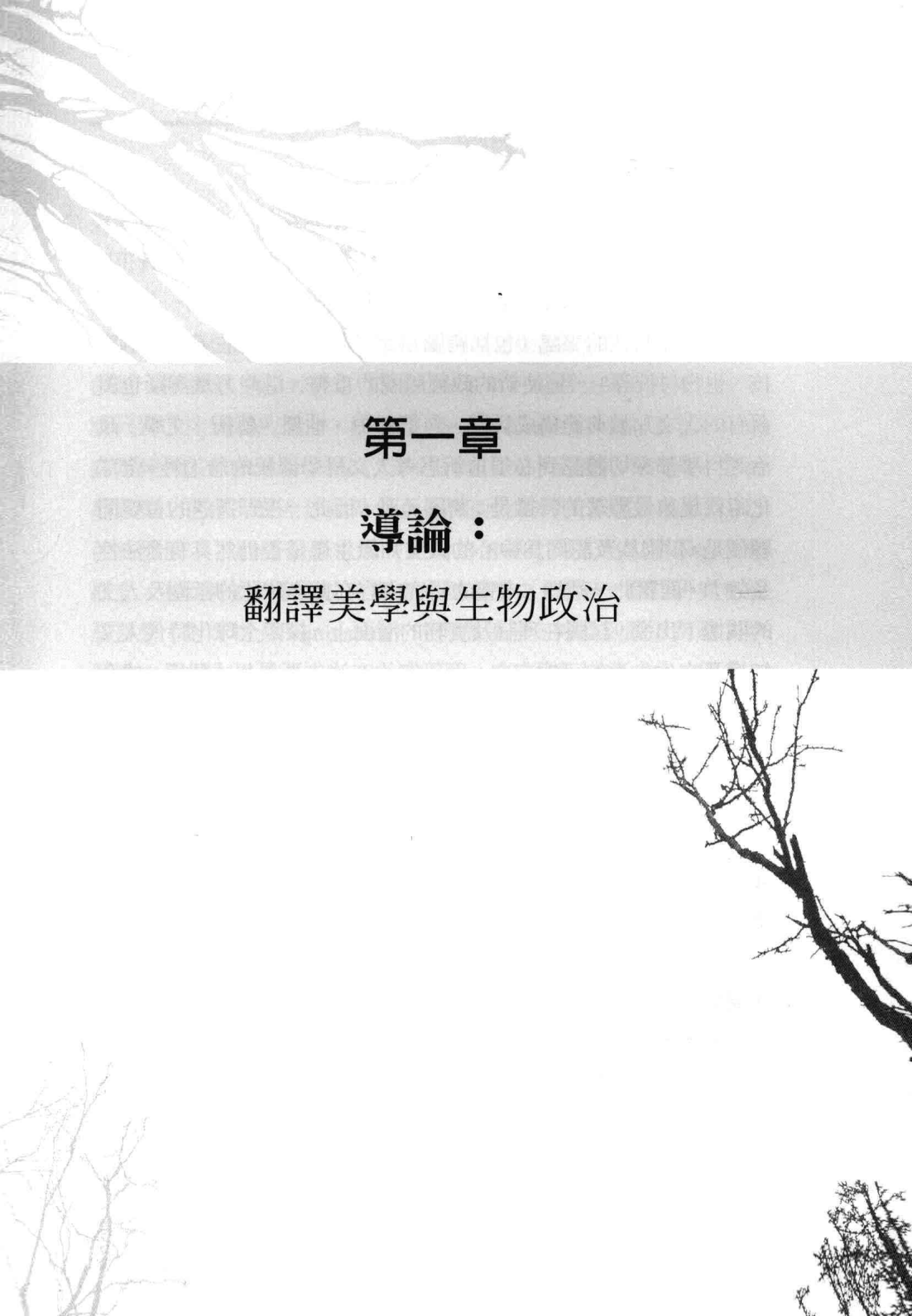
「台灣文學」的概念：台灣、亞洲、與世界

《亞細亞的孤兒》的寓言

台灣作為方法

參考書目 211

論文出處及說明 227



第一章

導論：

翻譯美學與生物政治

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包括跨國企業、戰爭、恐怖主義、資訊科技、生物科技等），迫使新的政經版圖的重整，這些力量無疑也對舊有的人文知識典範構成挑戰，包括歷史、地理、藝術、文學、政治等科學都深切體認到必須重新思考人文科學傳統的急迫性。全球化時代現象最顯著的特徵是：跨國流動，而此一視野遭遇的首要問題便是，以國族及認同為中心的人文知識生產是否仍然具有合法性及效力。面對此一難題，本書的研究內容在此全球化的氛圍及人文的關懷下出發，試圖在理論及實務的層面上，探索全球化時代人文知識及文化生產的可能方向，而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翻譯」的角度切入，藉以解讀台灣在地的文學生產，並進一步試探全球化下地方文學研究的新方向。其出發點是將在地文學視為各種文化交流聚合的一個範例，檢視諸要素在文本生產的效應，藉此了解各類文本符號的連結、斷裂、聚合、重組、分歧、與創造的歷程。此一異質元素交會的場域是「翻譯」的闖境空間，同時也是「文化差異」的空間。因此，一如書名所指出的，本書研究的主要內容即是探究異種文本符號的聚合、重組、斷裂、崩壞之書寫美學，以及翻譯者在此闖境中的生物政治。此一探究同時也回應全球化時代下，國族文化認同所繫的文化研究所面臨的挑戰。

如果全球化標示文化流動跨越疆界，那麼以國族文化認同為所繫的文學研究將面臨何種挑戰？文化文本跨越疆界之後，又以何種

方式與他種文本元素連結？在這一層思考上，翻譯的概念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鏡的視角。翻譯就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是由一個語言文本到另外一個語言文本的過程。在時間意義上是一次重複或重述，在空間意義上則暗指著疆界，包括語言、文化、社會、與歷史的穿透渡越（單德興 79-112）。¹就這一點來看，翻譯正好謀合了全球化時代跨文化研究的視角。芭絲娜（Susan Bassnett）在〈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一文中，指出翻譯與文化研究在全球化時代下不謀而合的研究取徑。在文章中，芭絲娜展示了翻譯從語言學的範疇如何轉化為文化人類學的文化概念，進而轉換到多重文化概念的變遷歷史。同時，翻譯研究也從語言學「對等物」（equivalent）的無盡爭辯，轉換到關於跨越文字疆界的「文本生產」（text production）的討論（123-40）。但此一轉向並非意指翻譯研究中的語言學對等物等根本問題獲得解決，而是翻譯問題在文學及文化研究的脈絡中轉化為美學典範生成與知識權力等問題。

本書幾個章節都是藉由翻譯的連續與斷裂切入，探索在地文學的表達形式，並進一步推敲台灣作家在翻譯書寫中展演的殊異主體

¹ 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單德興，告訴我們翻譯這個詞的時間及空間上的意涵。單德興特別從 Susan Bassnett 及 Harish Trivedi 的文章〈前言：殖民地，食人族、及方言〉（Introduction: Of Colonies, Cannibals, and Vernaculars）引述翻譯這個字時間上的解釋，「翻譯這個字在梵文裡面的字是 anuvad，它的字源主要的意思是在之後說或者再說一次，也就是透過解釋的重複，一種解釋性的重複或者重述，藉著說明或者是確定性的重述」。參閱單德興，79-112。

樣貌。從翻譯的角度來看，台灣進入現代世界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徑翻譯。這一進程可追溯到清末傳統文人翻譯中國、日本、乃至西方的文學及啓蒙論述。更大規模的翻譯則伴隨日本殖民主義的席捲而至，包括日人的文明開化論述，西洋及東洋文學及典範的翻譯輸入，及本地文人的翻譯摹寫等。這些議題在以賴和爲首的「台灣話文」書寫，日本殖民時期在地作家及內地作家的書寫，以及戰後包括王禎和在內的鄉土作家等，都有清晰的表達與深刻的辯證。而這些議題也是本書聚焦的主題，亦即，在實際文本及歷史社會脈絡中考察其書寫策略與權力政治。從這一角度看，翻譯不僅僅是語言以及文本翻譯等美學面向的意義，也同時具備政治、倫理、社會、與集體等面向的文化意涵。

以翻譯的研究取徑介入本地文學的生產，檢視翻譯書寫的表達形式及其生物政治，在全球化下在地文學研究的困境中，有其必要及重要性。首先，「翻譯」的視角將提供新的研究論述角度。台灣文學及文化研究長久拘泥於本土論及後殖民論述架構，然而，兩者都面臨全球化時代來臨的挑戰。本土論述立於本土，卻經常疏於在全球的視野中觀照自身，而後殖民論述以微弱的聲音道出全球化時代兵臨城下，但卻羈絆於二元或東西的論述邏輯，對於文化符碼跨國流動的面貌描述力有未逮。因此，本書中的研究內容藉由翻譯的角度切入本地文學的生產歷史，一方面回應接踵而來的跨文化論述，一方面重思國族文化認同爲本的文學研究界線，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有其迫切的必要性。第二、翻譯美學及其生物政治的關注也將提供新的主體形構與認同模式。由翻譯的跨語際著眼，翻譯的書

寫主體在不同的文本語境中穿梭渡越，於重複差異中生產的特定時空主體歷史，將有別於單一固定的主體認同。而且，銘刻於翻譯再現表達的文化差異，其權力政治在不斷地重複與差異中展演其特異性及雜燴性，並不必然取徑於二元對立的論述模式。第三、翻譯假定並架設了與世界對話的舞台。翻譯的另一層深意乃是其對話性。對於台灣歷史文學生產中翻譯問題的重視及研究假定了不同語言與文化的對話及交雜，這一取徑在全球的視野中更形重要。在全球跨國文化的流動中，翻譯同時架設了一個與世界對話的平台，文化元素在此平台中交流及對話，不同文化與主體的交涉協商在此平台上才成為可能。

如上所述，翻譯並非一門全新的學科，但在全球化下的文學及文化研究的困局中，「翻譯」，作為跨（國）文化流動的隱喻，取得了新的意涵。翻譯涉及的首要問題便是，不同語言間是否有絕對精準的「對等物」（equivalent）？雅克慎（Roman Jakobson）從語言學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但似乎給予了負面的看法。以詩歌的翻譯為例，雅克慎說明了翻譯無可避免的背叛以及語言的不可譯性（113-18）。但儘管如此，持續進行的翻譯又如何可能？翻譯行為在不同的語言文本中又如何運作？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原文」與「譯文」之間的關係？後結構主義特別關注這些問題，包括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及德·曼（Paul de Man）等人都對這些問題提出看法，主要包括本真性（authenticity）及本源性的（originality）等問題，而這些觀點主要表現在對班雅明的批評中²。從後結構主義的

² 這裡的討論主要參照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69-82;

觀點，德希達批評班雅明將原文與譯文對立的觀點，質疑其本源性及原作的概念。對德希達或德·曼來說，並不存在著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對立關係，因此也沒有所謂原文的概念。原文也是譯文，翻譯因此是一種「延異」(*différance*)，一連串無窮盡的意義指涉鎖鏈，其中意義不斷的延宕差別，因此原文與譯文之間的關係轉換成一種後結構式的互文關係。

後結構主義者對於翻譯的觀點，給跨國文化與文化翻譯研究帶來相當大的啟發。跨文化研究者從翻譯中找尋靈感，將本源性及翻譯忠實性的問題轉移到「差異」的問題。如果翻譯仍然無可避免，相較於觀照原文的本真性與翻譯的忠實與否等問題，跨文化研究者發現更有趣的問題是，不同語言間的假設性對等 (*hypothetical equivalence*) 以及譯文在新的文本中生成變化的歷程——用劉禾的話來說，即「生成的方式」(*manner of becoming*)。如劉禾所展示的，跨語或跨文化的研究不該再強調翻譯的權威或忠實性，而應著重於譯文在新的文本脈絡中變異的可能性與生成方式。如此一來，跨語言及跨文化研究的主要興趣變成是新的語彙、意義、觀念、概念、表達方式，如何在語言領域中跨越語言的疆界，然後在另一個語言當中居住下來的過程，以及透過此過程，在特定語言領域當中形成傳達、操作、佈置以及支配的方式。換句話說，從跨文字與跨文化的角度來看，翻譯的研究變成是一個「可能性變向」的研究，或者用劉禾的話說，「是關於語彙、觀念、範疇以及話語關係的一

Jacques Derrida, "Des Tours de Babel," 165-207, 以及 Paul de Man, Conclusion to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73-105。

種動態歷史的研究」(1-42)。

在劉禾的研究中，我們看見翻譯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密切聯繫。翻譯的概念揭示文化翻譯研究的幾個面向：首先，文化翻譯是否預設了文化之間的本源性與優位性？再者，翻譯理論是否必然將譯文轉為「深層意義」(profound meaning)的詮釋(interpretation)。周蕾提出了這些問題。在她的文章中，這些提問也成為東方與西方，或者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外另種「第三詞彙」(third term)可能性的探問(173-202)。

然而，文化翻譯掩蓋的正是權力的配置。蒲芮(Mary Louise Pratt)所提出的「接觸境域」(contact zone)一詞，早已是一個權力相互競逐的場域。儘管此一空白的境域從先前的歷史與地理的連續性中脫出，但佔據此一境域的旅行者，並非以「分離」(separateness)或「隔離」(apartheid)的族群姿態出現，相反地，在不同的主體互涉當中，不均衡的權力關係仍然介入操作(6-7)。

後殖民主義論述也同樣觀照原文(西方)與譯文(東方)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然而其論述一方面難以脫去二元對峙的論述邏輯，一方面又似乎預設原文的優位性。³薩依德(Edward Said)的「旅行理論」(traveling theory)在東西方學界旅行，看來似乎豐富了跨越國族文化疆界的比較文學研究。⁴儘管不斷強調旅行路徑極可能產生的轉化，但其出發點仍然是「起源」(origin)。印度裔學者尼

³ 這裡主要參照劉禾的論點。參閱 Lydia Liu, 20-25.

⁴ Edward W. Said, "Traveling Theory" in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226-47.

南賈娜 (Tejaswini Niranjana) 在其著作《定位翻譯：歷史、後結構、與後殖民脈絡》 (*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中，透過重新閱讀班雅明、德·曼、及德希達的翻譯理論，試圖重新翻譯或重新書寫印度的歷史，但其論述中仍不能免去將西方視為優位或本源性的存在。另外，史匹瓦克 (Gayatri C. Spivak) 試圖扭轉東西方文化翻譯不均衡的權力關係，重提翻譯的殊異性與翻譯政治。做為第三世界的女性翻譯者，她批評西方的第三世界文學翻譯忽略了其語言、文化及地域上的差異。史匹瓦克認為翻譯者必須回到文本的「修辭」 (rhetoricity)，以期使讀者可以感受到第三世界文學的殊異性，而非只是做為一個文化、一個差異文化，或是社會的表徵 (397-418)。對此，阿皮亞 (Kwame Anthony Appiah) 更直言，諸如此類西方人類學式的文化翻譯，背後其實隱藏了西方意識型態及種族主義的政治謀劃，因而提倡所謂的「厚翻譯」 (thick translation)，進一步理解異文化底層更深的內涵 (417-29)。

文化翻譯研究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認同問題，包括國族、性別、文化、與歷史的。翻譯中的差異所標示的正好是個人或集體的認同，且這一認同在語言的脈絡中，同時也在知識、社會、文化、歷史、與地理的脈絡中。為此，巴巴 (Homi K. Bhabha) 描繪一個「雜燴」 (hybrid) 的「第三空間」 (third space)。對巴巴來說，文化差異演示了一個類似少數論述的「補充性顛覆」策略 (162)，一個「回憶、遺忘」的閩界空間 (Sakai 148-49)。而這閩界空間也是一個指意的空間，在此，新意義進入，主體也將在此一空間演繹自